

历史时间、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

——科泽勒克与当代史学理论

陈慧本

【提要】 以叙事主义为主导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强调历史认识的想象性和历史表现的故事性,将历史真实性问题转化为意义之赋予和效用的问题,丰富和改变了有关历史实在的讨论方式,但同时也让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科泽勒克的史学研究实践表明,对历史时间问题的思考或许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弥补叙事主义的不足。他的史学研究以历史时间为主线,以概念考察为实例,指出历史行为主体的经验可以衔接实在与表现。科泽勒克强调历史认识主体本身所具有的彻底的历史性和时间性,这为克服历史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提供了启示。以时间性为切入点来反思历史实在论,可能有助于弥合历史与史学、生活与思想之间的鸿沟。

【关键词】 历史时间 历史实在 历史表现 科泽勒克

近年来,关于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争论渐趋平缓。学者们在此基础上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历史时间”“历史意识”“历史记忆”“历史伦理”等日益成为当前西方史学理论关注的热点。其中,以历史时间理论著称的莱因哈特·科泽勒克是被提及最频繁的学者之一。据统计,在《历史与理论》2008—2018年所刊文章的参考文献中,科泽勒克的被引率排名第三。^① 学界对“历史时间”的关注其实由来已久,据另一项统计,“时间/时间性”是自1945年以来西方史学理论界最长盛不衰的关键词;在2000—2014年,相关学术出版物占学科总体的10%以上。^② 这一方面是由于“时间”与叙事主义关系密切,保罗·利科曾指出,对历史时间的反思离不开叙事,反之亦然。^③ 另一方面,时间乃是历史学中最普遍的范畴之一,勒高夫将时间称作“史学最基本的素材”,而米什莱甚至宣称“历史即时间”。^④ 由此观之,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研究应受到我们的重视。本文主要围绕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析科泽勒克的相关论述与思想。^⑤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项目编号:19ZDA235)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李友东、李斌:《近十年来国外史学理论发展趋势的可视化分析——以“History and Theory”杂志为例》,《科研信息化技术与应用》2019年第2期。

② Berber Bevernage, et 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1945: A Bibliometric Stud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8, No. 3, 2019, pp. 431–432.

③ Paul Ricoeur, “Narrative Time”, *Critical Inquiry*, Vol. 7, No. 1, 1980, pp. 169–190.

④ 雅克·勒高夫:“1986年意大利语版前言”,载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Albert Cook, *History/Writ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 Antiquity and in Modern T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1.

⑤ 国内近期有关历史实在问题的研究,参见董立河《西方史学理论史上的历史客观性问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顾晓伟《后分析历史哲学与历史知识客观性的重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个新趋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4期;卓立《走出历史认识论——改革开放四十年史学理论话语范式的局限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2期。

科泽勒克尝试将存在论思想引入史学理论,以建立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的连续性。^①在他看来,历史实在的表现取决于多层次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源自历史现实,具有各自不同的时间性;为了澄清历史实在的表现及存在方式,首先要辨别复杂的历史时间。^②此外,科泽勒克考察了语言、时间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系,试图为历史实在的表现提供一个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

本文首先回顾叙事主义有关历史表现与历史实在之关系的论述,指出叙事主义在该问题上所面临的难题;然后简要阐明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及其中有关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之关系的讨论,分析其对叙事主义的潜在补充能力。有关历史实在的新洞见,必然牵涉对实在论和真理观本身的反思,在这方面,科泽勒克另辟蹊径地以历史时间为切入点,打通历史与史学,为学界理解历史表现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

一、叙事主义的实在论及其困境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强调在历史表现的层面上思考历史实在的重要性,从而改变了对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的提问方式。在形式层面上,叙事主义者探讨叙事或讲故事(story-telling)作为历史表现形式的认识论状况及其特征;在内容层面上,历史文本被视作一种“文学制品”(literary artifact)受到考察。叙事主义把历史作品的整体话语作为研究对象。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写道:“我将把历史作品视作它最明显是其所是的东西,即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它自称是过去的结构和过程的一种模型或图式,从而通过表现它们来解释它们是什么。”^③叙事主义强调,历史真实不仅关乎个体事件,还有赖于事件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这些关系的设定“仅仅存在于反思着它们的历史学家的心灵中”。^④历史表现的形式在逻辑上先于历史表现的内容,“故事不是被经历的,而是被讲述的”。^⑤

叙事主义者将历史实在视作一种语言之物,^⑥其典型代表便是怀特的“比喻实在论”(figural realism):“真实所指的总是某种被想象出来的东西。因为真实并非我们所可以直接触及的”。^⑦传统历史实在论的那种“历史本身”的实在,被叙事主义者当作“物自体”而搁置在讨论之外。他们这种立场强调过去作为叙事表现之内容的构建特征,历史实在本身是无法直接触及的,我们必须通过文本方可与之发生间接接触。叙事主义虽未否认历史实在的存在,但也或多或少将其放置在理论思考的次要位置,他们更注重史学层面的真实性,而史实层面的真实性要么受到叙事表现的制约,要么

① 这种存在论思想来自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3. Aufl., Max Niemeyer Verlag, 2002, S. 357-364.

② 科泽勒克多次引用赫尔德的名言:“每个变化的事物都具有自己的时间尺度;即便其他事物不存在,这个尺度也持续存在;世界上任意两种事物没有相同的时间尺度……在宇宙中任何一个时刻都存在着无数种时间。”Johann Gottfried Herder, *Metakritik Zu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Aufbau Verlag, 1955, S. 68.

③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

④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94.

⑤ Louis O. Mink, “History and Fiction as Modes of Comprehens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1, No. 3, 1970, p. 557; Arthur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1.

⑥ 安克斯密特称之为“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Martinus Nijhoff, 1983, pp. 100-104.

⑦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评述》,《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遭受置之不论的处境。

叙事主义认为,想象始终在历史表现的层面发挥着作用,史学家有意无意地遵从某种主导比喻,预构了其研究对象的历史领域。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叙事早在被言说或书写之前便具有了特定的内容,叙事形式的差异也将直接改变文本的意义和内涵,怀特称之为“形式的内容”。^①怀特不仅把比喻当作一种修辞,还认为这是一种用语言占有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这是一种诗性的预构行为,叙事的价值“源自一种使真实事件呈现出一幅连贯、完整、圆满和闭合的生活图景的渴望,这种渴望只能是想象的”。^②无论“历史本身”与其历史表现之间的差异如何被规定,差异本身只能由比喻的语言策略来规定。

叙事主义还将历史真实性问题转化为意义之赋予和效用的问题,主张历史解释的真实性有赖于它在实践中所能发挥的实效,读者倾向于认可哪种叙事的解释策略,取决于叙事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乃至意识形态的因素。历史叙事若是符合或引发了读者的道德立场,读者便会觉得这种叙事是有意义的,进而认同其对历史实在的表现。该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暗合实用主义的思路,即基于主体间的认同(identity)来重构真实性。^③据此,历史解释的真实性不是非此即彼的真假判断,而主要是取决于人们如何通过交流沟通来达成共识。在怀特那里,认同以审美的和伦理的(或两者统称为实践的)因素为基础,由选择、决定和践言等行动塑造而成;认识论因素在其中并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认同主要是以想象的方式达成的。怀特用意义和实践来说明历史实在,^④无论意义还是实践,在他看来主要是伦理和审美层面的事情,而与认识论和科学理性关系不大。^⑤

叙事主义使如下问题成为研究者面临的严峻挑战,即如何确立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联,进而重新确立历史认识的可靠性与客观性。怀特指出,人们之所以选择特定的叙事策略来表现历史,主要是出于审美和伦理层面的考量,而非取决于传统意义上的理性认识逻辑。叙事主义揭示了历史实在问题的复杂性;但与此同时,悬搁历史的“真”,转而探讨历史的“善”与“美”,导致“真”与“善”的对立,这个棘手的问题正是叙事主义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科泽勒克在评论怀特等人的叙事主义时认为,后者的研究过分专注历史表现层面,而未充分考虑历史事件进入历史表现层面的反思或主题化阶段之前的历史研究环节。他对历史表现理论的解释力表示怀疑,^⑥在他看来,用语言内在的顺序模式,来类比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的事态(Sachverhalten)、冲突与文化进入所谓研究对象领域之过程的顺序,这种解释较为牵强。

一些学者认为,怀特等人不仅误解了叙事与历史的关系,更误解了叙事与历史的各自含义。他们试图证明叙事本身便是其表现对象——历史——的产物,以此为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奠

① Hayden White, “Preface”, 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xi.

② Hayden White,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 Vol. 7, No. 1, 1980, p. 24.

③ 顾晓伟:《后分析历史哲学与历史知识客观性的重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个新趋向》。

④ Eelco Runia, “Inventing the New from the Old”, in *Moved by the Past: 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46.

⑤ Hayden White, “Historicism, History, and the Figurative Imagin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4, No. 4, 1975, p. 67.

⑥ 在德国史学界,科泽勒克较早关注怀特理论的学术价值,并且为后者的德文版《话语的转义》撰写了一篇较为中肯的导言,称后者阐明了历史叙述如何将经验转变成意义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有正当语言学依据的元史学”。Reinhart Koselleck, “Einführung”, in Hayden White, *Auch Klio dichtet oder Die Fiktion des Faktischen: Studien zur Topologie des historischen Diskurses*, Klett-Cotta, 1986, S. 6.

基。例如,大卫·卡尔主张历史实在本身具有叙事性,叙事源于生活,并且是在生活中被预构的。^①这种思路依旧围绕叙事来展开,实则与怀特等人共享着叙事表现的问题域,并在该语境中探讨“真理”“实在”“虚构”等史学理论的重要观念。

有学者指出,叙事主义的立场隐含着基础主义的残余,仍旧围绕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开展讨论。在怀特那里,相应的显著表征是刻意区分实践与认识论这两个维度,并将历史哲学与文学作品归为实践的,而历史学实证研究则是认识论的,似乎历史学家所表现的过去缺乏足够的实践因素。^②这是怀特思想中所隐含的二元论,也是他与实用主义貌合神离之处,后者将历史研究(包括历史书写)本身看作一种具有实际效应的行动。^③此外,根据怀特的看法,历史文本中的实在乃是通过比喻语言所表现出的一种想象,若进一步推敲,想象是否具有实践的基础?想象是否受到历史或生活实践的限制?由于其理论思考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于历史文本层面,叙事主义似乎无法妥善处理上述问题。固然,怀特等人所发起的历史叙事话语研究拓宽了我们对历史实在的丰富认识,但若是仅仅局限于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对历史实在的解释显然也具有局限性。

针对上述问题,怀特在其晚年的论文中,借用奥克肖特的术语,来区分两种实在论观点下的过去,即“历史的过去”(the historical past)与“实践的过去”(the practical past)。所谓“历史的过去”,是由职业史学家构建并共享的、可以用科学的方法不偏不倚地研究的过去,它缺乏对实际生活的益处,怀特在1966年《历史的重负》中提出这是作为人们之沉重负担的僵死的过去。^④“实践的过去”则是活的过去,是个体和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暂时性自我筹划的基础,也是人们感知生活情境、解决问题并且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怀特屡次援引科泽勒克的“经验空间”来说明后者,作为“经验空间”的“过去”是人们在当下对于过去的时间性经验,它是持续变动的。^⑤怀特试图将历史经验纳入叙事主义的理论中来,从而重新确立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的关联。可是,怀特仍旧区分了职业史学所关注的过去与实践的过去,似乎历史学科所研究的过去是缺乏实践性的。或者说,怀特在此预设了“实践”的两种含义:历史学的实践与日常生活伦理的实践。虽然他“挪用”科泽勒克的理论来说明过去与现在的关联,实际上他仍未摆脱二分法。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科泽勒克的思想语境,理解其历史时间理论的内涵。

二、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

科泽勒克的史学思想植根于德国诠释学的传统,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是他的精神导师,但他不

① 卡尔认为,故事“在经历中被讲述,在讲述中被经历”,他将经验视作衔接生活与叙事的桥梁,它有着准叙事的(quasi-narrative)或原叙事的(proto-narrative)形式,个体与共同体用叙事的形式来组织自己的历史经验,因此叙事与生活经验有着相似的构造与时间性。David Carr,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6, 61.

② Verónica Tozzi, “A Pragmatist View on Two Accounts of the Nature of Our ‘Connection’ with the Past: Hayden White and David Carr Thirty Years Later”,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1, No. 1, 2018, pp. 74–78.

③ 实用主义的先驱杜威认为:“历史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事件。它发生了,并且是在其发生时具有实存性结果(existential consequences)的事物。”约翰·杜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十二卷(1938)》,邵强进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178页。

④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 No. 2, 1966, pp. 124–125.

⑤ 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0, 15, 64, 100, 101.

完全赞同伽达默尔所说的“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① 语言性(Sprachlichkeit)是诠释学内在的展开方式,如果历史科学以及历史表现的方法仅仅是一种语言层面的活动,那么历史学必然将成为诠释学的一个分支。假如史学理论想要获得学科理论层面的独立地位,首先要做的便是证明历史学无法仅仅归结为语言活动,而存在着前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条件。科泽勒克认为,历史研究不只是历史书写或历史表现,比喻理论无法区分历史研究与历史表现。在他所理解的历史学整体过程中,历史表现只是组成部分之一。在怀特理论中处于边缘的认识论和科学性因素,在科泽勒克这里成为史学理论不应回避的重点。

科泽勒克认为,语言总是指称一个超越文本的世界,它触及了历史经验的人类学的、前语言的条件,这些条件有着自己的重复结构。历史经验的确是经由语言塑造和表现的,但又不只是如此,它们反复地以新的独特形式出现,从而产生各种新的历史。为了理解历史为何发生、如何展开、为何以及如何必须被研究和表现,历史学需要有一种理论上的把握。为此,科泽勒克着手建立自己的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这种历史知识理论要“同时涵盖事件的相互关联及其表现”,探讨“可能的诸多历史的条件”(Bedingungen möglicher Geschichten),^②考察历史之发生、发展、研究和表现的各个环节。

科泽勒克吸收了康德思想的元素,他的历史知识理论不把“历史本身”(Geschichten selber)当作可直接认识的对象,“通过历史学的方法被确立和呈现的事件,取决于对事实的虚构,实在本身已经消逝了”。^③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事件可以随意或武断地被确立,更并不意味着历史书写等同于文学虚构。证据和史料批判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发挥着一种检查的作用,科泽勒克称之为“史料的否决权”(Vetorecht der Quellen)。^④史料通过否定的方式,表明了哪些历史解释是不被允许的,这正是历史文本与文学制品的关键差异。

可见,就历史叙事的语言性和虚构性而言,科泽勒克能够与怀特达成不少共识。两位学者都看到了传统历史实在论的问题,认为历史本身是无法复原的,得到表现的“过去”和“历史”是虚构的。^⑤但两者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就历史实在而言,放弃传统的历史实在论并不等于完全解决了问题,仍然需要找到一种更具说服力的替代方案。相比于怀特放弃传统认识论、转而通过修辞比喻来论证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科泽勒克试图为历史学的认识论寻求更坚实的基础——存在论视域下的时间性领会。

历史认识究竟如何可能呢?科泽勒克给出的回答是历史时间。所谓的“历史时间”,指的是人类的时间经验,它关乎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对自身的定位,因而它不同于自然时间。^⑥科泽勒克认为,人

① 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 Bd. 1, *Hermeneutik I: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Mohr Siebeck, 1990, S. 478.

② Reinhart Koselleck, “Historik und Hermeneutik”, in *Zeitschichten*, Suhrkamp, 2000, S. 98. 在德国学界,“历史知识理论”指对历史学的系统性理论反思,是对历史学之科学性的说明。霍斯特·瓦尔特·布兰克:《历史知识理论》,载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125页。

③ Reinhart Koselleck, “Darstellung, Ereignis und Struktur”, in *Vergangene Zukunft*, 3. Aufl., Suhrkamp, 1995, S. 152.

④ Reinhart Koselleck, “Standortbindung und Zeitlichkeit: Ein Beitrag zur historiographischen Erschließung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Vergangene Zukunft*, S. 206.

⑤ Reinhart Koselleck, “über die Theoriebedürftigkeit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 316. 在另一篇文章中,科泽勒克曾直接援引康德的“物自体”概念。Reinhart Koselleck, “Vom Sinn und Unsinn der Geschichte”, in *Vom Sinn und Unsinn der Geschichte*, hrsg. von Carsten Dutt, Suhrkamp, 2010, S. 18. 大卫·卡尔也曾指出科泽勒克思想中的康德因素。David Carr, “Review of *Futures Past*”,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6, No. 2, 1987, p. 198.

⑥ David Carr, *Experience and History: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ical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8–30.

们的历史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看法。据此,研究人们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经验和表述,便成了理解历史经验的重要切入点。他选择“回到”海德格尔,以人类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为前提,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变动不居的相互关联中思考历史认识的可能性。^①这意味着,科泽勒克相信人类在时间中的自我筹划不仅关乎自我理解和自我解释,最终也关乎自我构建。这也意味着,人类的时间经验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内容,并且未来这个维度在科泽勒克的理论中有着显著的重要性,“若是没有行为主体的经验和期待,历史是无法构成的”。^②这还意味着,科泽勒克借由跳过伽达默尔回到海德格尔,为自己赢得一个更少依赖语言的历史认识论立场,他更重视历史行为主体的时间经验与行动本身,因为历史认识归根结底是从认识主体自身出发。^③虽然史学家唯有通过语言的表现才能够认识研究对象的时间经验,即便是那些未被语言表达的时间经验,如恐惧、期望、幻想,它们可能或确实影响了历史行为主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了历史事件,科泽勒克也尝试将它们纳入历史研究中。对于人的经验来说,没有纯粹的(或牛顿意义上“绝对的”)时间与空间,只有通过具有空间或时间的事物而体验到的经验。如果人们对时间的体验本身就是构建性的,那么所谓的“纯粹时间”反倒成了虚构,是理论化和抽象化的产物了。

历史时间理论是科泽勒克历史知识理论的精髓,他将历史时间当作人类的元史学或人类学范畴来理解:“如果我们想弄清楚‘历史本身’与无穷多的复数历史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一种历史时间的理论”。^④同时他也认识到,海德格尔没有真正把对时间问题的思考扩展到历史时间上来,从此在的分析中能够推导出历史的主体间时间结构吗?科泽勒克对此持保留态度,因为此在的时间性毕竟是以个体的“我”为中心展开的,历史学更应当考虑社会时间性。^⑤

“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与“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是科泽勒克历史时间理论中的一对关键范畴。^⑥根据他的设想,经验空间与期待首先是纯形式范畴,从它们本身之中无法推导出具体内容,因而两者并不表达任何的历史实在。他将经验比作洗衣机的滚筒,其中包含着的是绞缠在一起的衣物,一个由各种能唤起的自我记忆和对他人生活的认知所构成的整体。期待则如同一条视线,目力所及之处便是期待的界限。期待只是部分地来自经验,因为它还受到某些必须被期待发生的条件的限定;期待一旦形成,便也成为经验的一部分。此外,两者皆包含着不同的时间层次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05页。

② Reinhart Koselleck, “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 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 in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S. 351.

③ 有关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思想,参见张一兵《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与马克思的实践意识论——兼答苏州大学王金福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

④ Reinhart Koselleck, “Wozu noch Geschichte?”, S. 16. 科泽勒克更多使用“人类学的”(anthropologisch),但也使用“元史学的”(metahistorisch),就笔者所见,首次使用后者是在1970年。Reinhart Koselleck, “Wozu noch Geschicht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212, H. 1, Feb., 1971, S. 2.

⑤ 科泽勒克的这种看法部分地源自卡尔·洛维特,后者从伦理学和人类学的视角为人类的主体间性寻求基础,试图用第二人称的“你”来补充第一人称的“我”。Karl Löwith, *Das Individuum in der Rolle des Mitmenschen*,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9.

⑥ “经验是现在的过去,其中的事件已经融入现在,并且能够被记起。在经验中包含了理性的加工和无意识的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方式必然不是或不再是在意识中在场的(präsent)。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陌生的经验,它包含且保存在通过世代和制度来传递的特殊经验中。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自古以来也被理解成是一种有关陌生经验的知识……与经验相类似,期待也同时在个人和人际间的层面发生于现在,期待是(在过去)被想象出的未来,它针对的是尚未发生之事、没有被经验之事,以及只能推断之事。希望和畏惧、愿望和意愿、操心,但也包括理性的分析、接受的呈现和好奇心,这些都进入到期待中,共同构成了期待。尽管经验和期待都具有当下性,但两者并不是对称的互补概念,它们不是如镜像般相互对称地指认对方为过去和未来”。Reinhart Koselleck, “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 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 S. 354 - 355.

(Zeitschichten),比如源自古罗马时期的习俗、中世纪的宗教理念、对昨天的记忆,又如对明天的期盼、对命运的恐惧、对末日审判的向往等,它们都以不同的速率汇入现在的时间经验中。在他看来,若是没有经验和期待,任何其他历史中的范畴都是不可想象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必须协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以便生活,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强烈冲动,是人们在世界中存在的根本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中使用的形式范畴几乎都与隐喻有关。他认为,谈论时间时必定要依靠空间性的隐喻。因为只有特定空间中的运动,才能形象地清楚说明时间。时间的前进,乃至进步或发展本身便“包含了形象说明的图像”,通过这些图像人们能够获得对时间的认识。但是在历史经验中,空间(经验)又是在时间中构成的,它因而变得可测量,并由此在政治或经济层面上可得到控制。文化的差异(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的差异)制约着地理空间的划分。

根据科泽勒克的观点,一切可能的历史都以行为主体的经验和期待为基础。一方面,人们基于自己的经验空间展开行为;另一方面,人们的行为总是与特定的期待视域有关。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经验聚集到经验空间之中,而原有期待的落空也迫使人们产生新的期待,于是“经验与期待之间的张力,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激发出解答,从而萌生出历史时间”。^①两者构成了现在的某种时间差异,现在以不同的方式与过去和未来相互交织,这也意味着不同的时间层次以各自的变化速率汇入现在。由此,历史时间的变化不仅开启也限定了人们在历史中的存在状态,甚至人们对“历史”概念的定义也基于历史时间的变化。

在科泽勒克看来,时间经验还能说明历史研究是如何展开的。根据科泽勒克对“经验”的概念史考察,在古希腊语中,“Historia”最初的含义乃是德语中的“经验”(Erfahrung)。所谓的“获得经验”(Erfahrung machen),指的是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同时也是一个发现之旅。他指出,唯有通过报道旅行并反思对旅行的报道,历史学(Historie)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正因如此,他将历史学称作“纯粹的经验科学”(Erfahrungswissenschaft schlechthin)。根据时间经验的变化,科泽勒克区分了三种历史书写的主要模式。第一是写下(Aufschreiben):在事件发生时随即书写历史;第二是抄写(Abschreiben):在事后对原有事件经验和意义的延续;第三是重写(Umschreiben):新的经验改变对事件的看法,迫使人们寻求新的解释。期待落空的强度越大,重写历史的要求也就越强烈,科泽勒克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相比于胜利者,失败者对于历史的反思更加深刻,“胜利者书写短期历史,失败者深刻反思长期的历史。经验导致不同的方法,方法使经验延续”。^②科泽勒克还考察了历史书写的时间性,他认为多层次时间也是历史文本的特质。^③书写历史这个行为本身并不是历史认识的最后一步,书写历史也不是自我闭合的。书写历史也是一种可发挥效力的实践,是史学家确认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寄托着史学家自己对过去的认识、对现在的感知以及对未来的筹划。

科泽勒克的历史认识论可以视作一种受限于时间性的视角主义。他援引歌德的说法,认为世界历史总要时不时被重写,这不是因为新材料的发现,而是由于人们的处境与经验不同了,即视角也变化了。^④历史认识必然要求多元的视角,历史解释因而具有暂时性,这是他遵循海德格尔的思路,从

① Reinhart Koselleck, “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 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 S. 358.

② Reinhart Koselleck, “Erfahrungswandel und Methodenwechsel”, in *Zeitschichten*, S. 77.

③ Reinhart Koselleck, “Die Zeit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Zeitschichten*, S. 287–298.

④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Farbenlehre, Sämtliche Werke*, Bd. 29, J. G. Cotta, 1851, S. 95.

历史行为主体的时间性出发构想历史世界图景的必然逻辑后果。

科泽勒克认为自己所使用的元史学范畴,如“时间层次”“经验空间”“期待视域”,都源自近代以来特定的时间经验。这便意味着,这些范畴及它们所构成的理论,包括用以表现历史的语言,本身也是特定历史经验与情境的产物。换言之,史学家用以表现其研究对象的概念,同样源自特定的时间经验,概念凝结着某个时代某个群体对于历史和自我的暂时性理解。新的时间经验将催生出新理论构建,史学家在表现其研究对象时,总是需要找到与之相契合的理论及语言表现形式。

三、从历史时间理论反观叙事主义

尽管在历史表现的效用、历史学的认识论与科学性因素等方面存在分歧,科泽勒克与怀特等叙事主义者都注重历史认识的时间性,当然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传统的历史实在论中,历史的真实性被视作一种超时空的存在,因为过去的事实是固定不变的,而语言能够反映这些事实,它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泽勒克和怀特都将时间性纳入有关历史实在的思考中,他们都主张必须在人类的时间经验中开展对历史实在的讨论。怀特通过强调历史文本的语言特性与诗性思维的预构,从而说明历史叙事的连续性是如何通过语言表现构建出来的;科泽勒克则强调历史经验本身乃是时间中持续变动着的构成物,指出了历史认识与历史科学性的时间性。

在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的关系方面,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能够有效地补充怀特的比喻理论。在怀特那里,对于特定历史事实或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表现可以有多种相互竞争的叙事模式,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何史学家们会选择不同的表现模式,其选择的依据和界限是什么?前文提及,怀特似乎认为选择的依据主要是审美和伦理的因素,但他没有进一步展开这方面的阐述。又如他告诉我们,历史文本的叙事结构乃是想象的产物,但这种想象的基础是什么呢?是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抑或纯属个性的选择?根据科泽勒克的想法,时间经验是书写和反思历史的基础。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某个史学家之所以选择某种历史表现模式,乃是因为他有着特定的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诠释学处境,他对生活与历史的特定感知构成了他叙写这种故事的前提。

在历史实在问题上,怀特将自己严格地限定在历史表现的层面。以连贯的故事为表现形式的真实性,只能存在于历史叙事中。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尝试过某种具有叙事连贯性的生活,而生活本身是不具有故事形式的。在他看来,死亡是人们共同的命运,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生活都将以同样的结局告终,因此“生活的故事”注定无法连贯。^①而在科泽勒克这里,时间经验作为人的存在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具有“完形”(Gestalt)或塑形(configuration)的功能。^②人们用类似于叙事的形式来组织它,确保了历史与历史学的连续性、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的连续性。按照通常对“历史”概念的辨析,我们还可区分学者们思考历史实在问题的不同侧重点。海登·怀特等叙事主义者探讨历史表现与叙事作为史学实践的特征,强调史学或历史书写层面的真实。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试图融合历史(Geschichte)与史学(Historie)的真实,“历史与史学,实在与其意识加工,总是相

①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② 近年来,卡尔也持视角主义的观点,并且尝试用现象学的思路阐述“时间视角”(temporal perspective)。David Carr, "Reflections on the Temporal Perspective: The Use and Abuse of Hindsight",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56, 2018, pp. 71-80.

互指称,最终相互奠定基础,但无法完全相互推导”。^①人们有着对历史过去的前主题(pre-thematic)意识,即便史学家也是如此,它充当着人们对现在的经验背景;即便是在历史研究中,这种源自生活的时间性经验也没有被取代,而是隐含在历史判断之中。

相较于怀特等叙事主义者,科泽勒克没有停留在历史研究对象与历史认识主体的二分法层面,他强调历史认识主体本身所具有的彻底的历史性。人们是从自己的生存处境出发,来实践、认识和叙述历史的。由于处境和历史经验随着生存状况而不断变化,人们对于历史证据的理解和历史方法的掌握也是变动不居的,对过去事件的叙事和表现存在着各种迥异的方式,虽然每种方式都有可能赋予过去事件以连贯性,这进而意味着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出自某种“非完全性的前理解”(Vorgriff auf Umvollkommenheit)。^②归根结底,历史认识和历史表现源自人们的生存实践,并且它们本身也是一种生存实践的方式。^③如此一来,历史表现就被视作人类历史的一个环节,历史之发生、发展、研究和表现将呈现为一个动态的时间性展开。科泽勒克主张历史认识具有理论构建的前提,而这种理论构建与人们的生存实践直接相关,因而可以确保史学实践的连续性和科学性,同时允许学科内部不同历史解释的竞争和认同。

结 语

科泽勒克史学理论的学术价值,可从叙事主义内部的转型得到印证。近年来,叙事主义的聚焦点逐渐从叙事转向经验。安克斯密特认为,语言和文本一方面使得历史经验得到交流,另一方面也阻碍和“驯化”了人们对历史经验的直接性接触。^④正是在这种理论反思下,他撰写了《崇高的历史经验》。卡尔也认为,“经验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将其与叙事形式作比较是远远不能涵盖它的”。^⑤科泽勒克本身便是一位具有丰富史学实践的历史学家,他对史学理论的反思充分关注了历史学的经验性。通过引入存在论的思想,他为关于历史经验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

近年来,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愈发受到后分析历史哲学家们的关注。^⑥有学者认为,科泽勒克的不少观点可与实用主义的思路互证,比如科氏所说的重写历史,就与蒯因的“信念之网”极为契合;而他倡导历史认识层面的“视域融合”,可类比戴维森的“宽容原则”。^⑦虽然这种比较有过度阐释之嫌,但也确实为我们全面评估科泽勒克史学思想的学术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实用主义哲学家们依据人类主体间的认同(identity)来重建真实性的基础,如果从这种观点来关照历史实在,那么历史解释的真实性就不是真与假之间的非此即彼的抉择,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如何通过交流沟通来

① Reinhart Koselleck, “Erfahrungswandel und Methodenwechsel”, in *Zeitschichten*, S. 32–33.

② Reinhart Koselleck, “Vom Sinn und Unsinn der Geschichte”, *Merkur*, Bd. 51, 1997, S. 326. 可将“非完全性的前理解”与伽达默尔所说的“完全性的前理解”对比。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 Bd. 1, *Hermeneutik I: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S. 299.

③ 正如马克思所说,实践是理论的出发点、基础和最终目的,实践与理论是相互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1页。

④ Frank Ankersmit, “The Postmodernist Privatization of the Past”,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2.

⑤ David Carr, *Experience and History: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ical World*, p. 4.

⑥ 这与科泽勒克汲取海德格尔的思想有关。理查德·罗蒂:《实用主义哲学》,林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9页。

⑦ Donald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Vol. 47, 1973–1974, pp. 5–20.

达成共识。反思历史实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主体间性。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为思考主体间性的基础提供了启示。相近的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或许是认同的基础。科泽勒克考察过欧洲历史上的“我们—他们”观念的演变,他分析了三组看似对立的范畴:希腊人—蛮族,基督徒—异教徒,人—非人。根据他的分析,这三组对立范畴其实都存在相互转化和相互承认的可能性。^①因此在科泽勒克那里,“视域融合”是可能的。但是这种融合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他本人对跨文化的概念史持保留态度。^②我们必须注意到,上述三对范畴其实都是源自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产物,这也体现了科泽勒克本人及其历史情境的时间性和有限性。^③

主体间性促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当谈论历史与过去时,似有必要先明确所谈论的是谁的历史、谁的过去。怀特与科泽勒克也无法超越自己的时间性,他们所谈论的,归根结底是作为西方主体的“我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的中国学者,能够为关于主体间性以及历史实在的反思提供新的学术思路及研究。

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还提醒人们去思考未来这个维度,而这是以往史学研究中所忽视的。近年来,他的学生霍尔舍尔开展了有关未来的实证研究,他考察了近代以来欧洲的“未来”概念史。^④限制史学家探讨未来的重要因素之一,乃是史料和历史文本的表现形式,在传统的文字史料中,人们很难去探究史料中所记载的梦、愿望、预测等是否是真实的“过去的未来”。科泽勒克的相关研究或许能促进我们的思考:史料的语言文本性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历史与语言之关系的反思?新形式的视觉材料能否促使人们改变对时间的感知?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作者陈慧本,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后;邮编:200234)

(责任编辑:董欣洁)

(责任校对:李桂芝)

① Reinhart Koselleck, “Zur Historisch-politischen Semantik asymmetrischer Gegenbegriffe”, in *Vergangene Zukunft*, S. 211 – 259.

② Reinhart Koselleck,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and Juan Francisco Fuentes, “Conceptual History, Memory, and Identity: An Interview with Reinhart Koselleck”, *Contributions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Vol. 2, No. 1, 2006, p. 110.

③ David Carr,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pp. 177 – 185.

④ Lucian Hölscher, *Die Entdeckung der Zukunft*, Wallstein Verlag, 2016, bes., S. 91 – 288.